



“黑色肥皂”保卫战

1908年初，天津市面上同时出现了两种黑色肥皂，一种标注为“天津造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造胰公司”），另一种则标注为“华胜公司”（全称“天津华胜烛皂有限公司”），两种肥皂几乎如出一辙。很多因为价廉物美而一直选购造胰公司黑色肥皂的顾客误买了后者的产品，使用后才发现质量极差，纷纷大呼上当，甚至认为造胰公司占领市场后偷工减料，牟取暴利。造胰公司的创办人宋则久听到有人仿冒黑色肥皂的消息后也是大吃一惊，因为这种肥皂是该公司煞费苦心研制的拳头产品，而且已经在商部立案，享有五年专利权，他人不得制造类似产品。如今出现劣质仿冒品，公司声誉可能就此毁于一旦。宋则久赶忙找到华胜公司经理李镇桐，当面要求停止侵权，收回伪劣。但李镇桐以造胰公司只是立案，并无官方证明文书为由，拒不承认仿冒侵权一事。即便后来宋则久向直隶工艺总局提起控诉，华胜公司也咬定造胰公司没有商部的专利证照，依旧我行我素，大肆生产。这一黑色肥皂专利权之争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切还要从宋则久创办天津造胰公司说起。

自晚清开埠以来，以肥皂为代表的西方清洁用品由于在去污能力和使用便利等方面的优势，开始在中国流行，加之外商采取廉价出售、抢占市场的策略，洋肥皂很快便在国内大行其道。以天津为例，20世纪初每年进口条皂5万箱，价值10余万两白银。目睹洋货泛滥、白银外流的状况，爱国商人宋则久打算采取集

资方式创办有限公司，以振兴工艺，弥补漏卮。他在1903年招股集资筹办造胰公司，最初设于天津黄姑庵东老公所胡同，后因地势不佳改设在闸口元会庵内。同年10月呈请天津府县两署立案。1904年开始制造各种肥皂。1905年原定股本5000元(每股50元)已如数招齐，得以正式在商部注册，公司也定名为“天津造胰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中国人自行建厂制造肥皂的开端。

为增强造胰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宋则久在引进人才和改良技术两方面双管齐下。他聘请东京大学工科毕业生张星五为公司董事，严智怡为工程师(后张退出，严智怡为董事，主抓技术管理)，还雇用日本人为工头，积极引入日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同时，花费重金购置外国先进机器设备，先后从日本购进数台制胰机和制烛机，从德国购入锅炉汽机。1908年后，造胰公司实现了由手工操作到机器制造的迭代升级，生产效能大幅提升。据商会档案记载，当时造胰公司每月生产条胰、块胰五六百箱，香胰六七百箱，洋烛两三百箱，在同行业中位居翘楚，十分畅销，年年获利。

造胰公司的发展风生水起，黑色肥皂功不可没。1906年，造胰公司遍寻国内各种制胰原料加以比对，又反复优化生产工艺，终于研制成功质优价廉的黑色肥皂，分为两种：其一为洗面粗香胰，又名“黑方块”，其二为洗衣黑条胰。两种肥皂的质量与市面主流品牌并驾齐驱，但每箱单价却便宜很多，凭借价格优势，不仅占领本

地市场，更行销华北地区各大商埠，造胰公司很快便站稳脚跟。

为防止他人仿冒，宋则久未雨绸缪，在1907年通过直隶工艺总局向商部请求为黑色肥皂立案，并如愿获得五年的专照权限。在此期间，造胰公司享有此种肥皂独家专利权，他人不得制造类似产品。但令宋则久始料未及的是，由于相关专利章程尚未订立，商部只是将造胰公司申报的商标图样及文字存部备案，并未正式颁发证照，这就让竞争对手钻了空子。

1908年，华胜公司借增资扩股至10万元并改为机器制造的机会，通过天津商会向商部请求授予该公司在直隶省内专办20年的地位，其间他人不得申请开展机器制胰类的生产经营活动。然而商部以造胰公司创办在前、华胜公司并非首创为由，拒绝了该专办权的申请。与此同时，已经通过优质产品抢占市场的造胰公司也走上了机器制胰的快车道，公司业绩蒸蒸日上。相形见绌之下，李镇桐恼羞成怒，打起了仿冒黑色肥皂的歪主意，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1908年5月，就在李镇桐认为造胰公司无计可施、沾沾自喜之际，宋则久突然造访，拿出了专利证明文书，再次要求华胜公司停止侵权。原来造胰公司特意向商部请求颁发专利证照，商部也很快批复颁授。面对白纸黑字的证明文书，李镇桐再也无法狡辩，只得停止仿冒，收回伪劣。就在造胰公司认为此事告一段落之时，不料华胜公司贼心不死，于1909年3月向天津商

会呈送样品，辩称其产品原料与造胰公司不同，企图申请专利。宋则久只得与公司董事联名上书工艺总局，声明造胰公司既然已获专利，无论他人使用何种不同原料，只要制售形色相同的肥皂，均属侵权。黑色肥皂是该公司呕心沥血之作，华胜公司竟想不费丝毫心力资材，“贪人之功以为己利”，若不加以严行禁止，以儆效尤，必然会对处于萌芽期的中国工业造成极大危害。由于理据充分有力，直隶工艺总局与天津商会采纳了造胰公司的建议，严令华胜公司不得自行产销黑色肥皂，这一场围绕黑色肥皂的专利权纠纷至此才画上了句号。

尽管造胰公司赢得了专利权保卫战，但由于造胰工艺粗浅，致使仿冒成风，后来又有益和公司因仿造黑色肥皂而被造胰公司禀请劝业道查究。宋则久认为要想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必须主动出击，因此他通过巡警总局将很多专利告示张贴于大街小巷，希望用广而告之的方式吓阻牟利之徒的仿造冒牌。正是由于造胰公司注意维护自身品牌价值，与仿冒者坚决斗争，才使得以黑色肥皂为代表的优质产品助推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1923年时，公司营业额已增长到70余万元，1925年在北京兴建分厂，产品畅销华北、东北各地。包括黑色肥皂在内的各类洗涤制品，先后在巴拿马、意大利、南洋等万国博览会及国内工商展览会上获评优等多达20余次，也使得造胰公司蜚声国内，乃至名扬海外。

张弛

成语小故事——

舍旧谋新

春秋时，晋文公曾在国外流亡了十九年，后来得到楚国的帮助，才有机会回国做了君王。当时，楚国的势力很大，许多小国都向楚国称臣；晋文公为了成为霸主，就决定从立威诸侯做起。恰巧，为了曹、魏、宋三个小国，弄得晋、楚反目成仇，楚国派大将子玉和晋军作战，晋文公遵守当年的诺言，把军队撤退到九十里外，以报答楚王从前对他的优待；但是，楚将子玉仍然坚决要和晋国决一雌雄。当晋军撤退到城濮的时候，晋文公非常苦闷，他听到大家都在说：“我们的君王德行高超，应该舍弃对楚国的旧恩，建立新的功劳。”晋文公听了，恍然大悟，便重整军队，终于在城濮打败了楚军，称霸诸侯。后来的人，便将晋文公部下所说的“舍其旧而新是谋”，简化成“舍旧谋新”这一句成语，用来比喻抛弃旧的计划或人事，重新规划，建立一个新的事业。

我们无论做任何事，应该要日新月异，追求进步，一旦发现旧的方法不适用得到的时候，要立刻采取新的方法，才能够得到更好的效果，这便是“舍旧谋新”了。

拾人牙慧



这个成语出自《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浩)云：‘康伯未得我牙后慧’”。东晋时候，有一个名叫殷浩的人。因为他曾经当过“中军”的官职，所以被人称为“殷中军”。他曾被任命为“建武将军”，统领扬州、豫州、徐州、兖州、青州兵马，后因作战失败被罢官，并流放到信安（今浙江省改头换面）。殷浩很有学问，他爱好《老子》、《易经》，并能引经据典谈得头头是道。殷浩有个外甥，姓韩，名康伯，非常聪明，也善于谈话，殷浩很喜欢他，但对他的要求却十分严格。殷浩被流放时，康伯也随同前往。有一次，殷浩见他正在对别人发表言论，仔细一听，康伯所讲的，完全是抄袭自己的片言只语，套用自己说过的话，没有他个人的创见，却露出自鸣得意的样子，很不高兴，说：“康伯连我牙齿后面的污垢还没有得到，就自以为了不起，真不应该。”

后人根据这个故事，引申出“拾人牙慧”这个成语，比喻抄袭或改头换面地套用别人说过的话或写的文章。

天津地名考——

元明时期天津公路

元代建都北京后，天津因地理位置的重要和水运的便利，逐渐成为北京粮食、丝织品及北方军粮东南供应的漕运枢纽，每年经天津的漕粮都多达二二百万石，天津漕运已成为元大都的生命线。元政府向天津派驻军搞屯田，加强防守。这也促使天津经济的繁荣、居民点的形成和道路的发展。这时天津地区“舟车攸会，聚落始繁”。

当时，宁河尚未设治，宝坻、蓟县、武清均隶属中书省大都路，静海则隶属河间路，今天的天津市区及其东、南、西三郊多为静海地。此时天津境内道路交通——由宝坻往西30公里，由武清往东北35公里，由静海往北120公里，由蓟县往西南75公里，均可达香河县城；由静海往

西北70公里，可达永清。元末农民起义的行军路线，史书记载均涉及这些道路。

明代以来朝廷在天津建设海防、修筑炮台、发展漕运、大兴屯田，使天津城区不断扩大，人烟逐渐稠密，经济迅速发展。明代中后期在近郊形成许多居民点，如三岔口、咸水沽、小南河、大直沽、稍直口、独流、葛沽、东沽、西沽、邓善沽等里坊。城里与这些聚落以及区域内部的道路都有很大发展。

明永乐在天津境内设驿站，其中有乾宁驿站(今青县)、奉新驿(今静海县)、杨村驿(今武清区)、杨青驿等。这些驿站主要分布在北京至天津、天津至济南、天津至山海关的官驿大道上。明政府把天津视为护佑

京都的重关要地，在此修筑了东北可至山海关外、西北可至张家口、西南可达黄河岸、东南可达德州、济南的道路。

据资料载，明代天津通往四方的公路有：天津临榆线一进山海关，经昌黎、卢龙、唐山、汉沽、塘沽至天津；邦均遵化线一进喜峰口经遵化、蓟县、邦均、三河、通县至北京，或由蓟县南下至天津；天津德州线一到天津后至杨柳青、静海、青县、沧县到德州、济南；天津保定北线一由天津经霸县、河间至保定；天津北京线一由天津经杨村、武清、通县至北京。另外，还有以天津为中心分别通往宝坻、杨村、宁河、静海、蓟县、香河及三河的道路。

津门旧事——

气度不凡的“天津法鼓”



为边走边奏的“行会”。其乐队由一面大鼓和若干大钹、大铙、镲铬、钲铛所组成，人数可多可少，但都须成双成对地配备。其声音雄浑嘹亮、节奏丰富多变，令观者振奋昂扬。演奏时，大鼓与紧挨身边的“头钹”起着指挥的作用。整套音乐多以慢板开始，逐渐转入中速，进而快速，最后高潮部分以急板结束。演奏《咬五通》时，五种乐器有分有合，变化多端；而演奏高潮部分的《上播》时，大钹、大铙的演奏者还要加上“耍钹”、“飞铙”等舞蹈动作，它是在武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程式有“鹞子翻身”、“海底捞月”等三十多

种。表演时，铙在演员周身上下翻动、金光熠熠；钹在演员手中烁烁翻动，其长长的缨穗凌空飞舞，再配以撼人心魄的音响和节奏，真可谓“鼓打惊雷、钹翻燕飞、铙回蝶舞、铬拍玉板、钲敲雨霁”。

天津法鼓是在天津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成长的，它综合了音乐、舞蹈、武术、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独具特色。天津人创造了天津法鼓，天津法鼓也塑造着天津人。在天津法鼓那雍容威严的形式和铿锵炽烈的节奏里，天津人读到的是自己粗犷豪迈、爽朗乐天的性格。

馆藏珍品——

朱砂荷鱼澄泥砚



明朱砂荷鱼澄泥砚长24厘米、宽15.4厘米、高2.2厘米，在烧造工艺和雕琢构思上皆有独到之处。此砚作鱼形砚身，呈朱红色，泥质细腻，色泽鲜艳。砚背衬以荷叶，荷叶及鱼周于烧制前均着黑色，黑红相映，荷鱼交辉，浓艳与沉着相得益彰。可谓造型生动活泼，雕刻精细传神，线条流畅自然，色彩鲜丽华

美，技法高超，巧夺天工，

是极为稀见的古代文房艺术精品。

此外，砚台盒盖之上亦刻铭文曰：“澄泥荷鱼研 初颐国家旧物，河间吴棠湖购得收藏”。可知该砚后被清末书画家、收藏家吴浔源先生收藏。1954年，明代荷鱼朱砂澄泥砚由天津著名文物收藏家徐世章先生的亲属捐献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由此可考，此砚经多位名家收藏鉴赏，流传有绪，实为难得。

龙香御墨

明龙香御墨直径8.7厘米、高1.7厘米，圆形绿色彩墨，一面有描金双龙戏珠图案，中间楷书“龙香御墨”，背面阴刻“大明隆庆年制”楷书款。

《涉园墨萃》中“中舟藏录”(袁励准)著录赭彩墨两件，其中一件形式、尺寸与此墨完全一致。明《麻三衡墨志》“槽式”中列有“龙香御墨”一种，与“探微神品”同为嘉靖御墨。馆藏此件为隆庆年制，说明嘉靖至隆庆年间均有制作。此墨一面模印双龙，龙的形式与明代瓷器上的龙纹相同，具有一致的时代风格。



经之墨



明经之墨直径10厘米、高2厘米，墨作圆形，四周浮雕龙纹，中间篆书阳文“经之墨”，右侧“嘉靖”二字款，背面作团龙纹。此墨下端磨过，从磨过的地方看没气孔，可见其原料细腻，质地缜密，且墨模雕刻精细，虽磨用过仍不失为是一件珍贵的墨品。

古墨鉴赏家尹润生先生在《明清两代的集锦墨》一文中曾述及此墨：“休宁汪中山所制的墨品目繁多，至今流传下来的只见一锭，正圆形，下端磨去少许，名叫‘经之墨’，并署有嘉靖年款。顾名思义，当为经、史、子、集四种丛墨之一。”

高兆铭赤壁图端砚

清高兆铭赤壁图端砚长27.2厘米、宽21.6厘米、高4.5厘米，砚作随形，为老坑石，依石材自然形式，就石皮的凹凸态势琢成赤壁图，砚面中间作砚堂，四周环刻高山流水。砚首正中处镌篆书“高风千古”四字。砚背雕有赤壁泛舟图，并刻有楷书铭文：“个是苏公赤壁，千古英雄陈迹。聊供几案卧游，珍重端溪片石。”落款“固斋高兆”。隶书铭文：“守其静也如仁，而动则惟水。扩其动也如知，而静则惟山。得仁知之乐者，善其用于山水之间。壬辰冬至，吴秉钧铭。”铭文旁阴刻篆文印“山阴吴氏珍玩”。下镌“琰”、“青”二印。印旁刻“庚申（1920年）冬季归于退耕堂。”退耕堂为民国总统徐世昌斋名。该砚是其珍藏砚台名品。



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砚



明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砚直径18厘米，厚10厘米。砚面开月牙形水池及弧形砚堂，水池之上有“内府之宝”方印，印两侧各一篇顾从义摹刻的“石鼓文”。砚底中部纵开长方形凹面，内书“石鼓”、“子子孙孙用之永保”、“东海顾从义摹勒上石”，凹面两侧亦分刻两篇“石鼓文”，凹面之上刻有朱善书题铭，表明他于道光辛

丑(1841)年重资从曹绍楠处购得此砚并珍藏。砚体一周摹刻六篇“石鼓文”。整砚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砚盒制造亦考究，紫檀木质，形状亦仿石鼓。盒盖一周雕刻花卉纹饰，中间镶嵌白玉螭纹装饰。盒身一周刻程瑶田《石鼓砚记》及孙效曾题诗。

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因刻于十座形似鼓的花岗岩石墩上而得名。石鼓文内容为记述周秦王室游猎之事，是研究其时历史、文学的珍贵资料。石鼓出土于唐初，现最接近原石的宋拓本在国内已无流传，此砚即摹刻于宋拓，是研究石鼓文的重要参考。